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综述

张 洁

(安徽三联学院就业创业处, 合肥 230601)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日渐升温,尤其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课题。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其研究也随之兴盛。学术界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可划分为肇端期、发展期和兴盛期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研究均有不同的研究侧重点:肇端期主要关注海外贸易研究,发展期的研究逐渐扩展到文化交流层面,兴盛期则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演变、贸易状况、文化交流、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等各个方面。尽管以往关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在断代史研究、贸易对象、贸易产品、文化交流方面仍存在不足,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K9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9) 08-0389-09

Research review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Ningbo

ZHANG Jie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nhui Sanlian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tud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has been rising day by day, and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for academic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since "the 21 century Marine Silk Road" was put forward. "Maritime Silk Road" in Ningbo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China. The research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Ningbo is also flourishing day by day.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Maritime Silk Road" in Ningbo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beginning stage,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prosperity stage. The research in each stage has i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beginning period, the study of foreign trade is mainly concerned. The research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gradually expands to the level of cultural exchange. The prosperity stage involves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Marine Silk Road", trade situation, cultural exchanges, resource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lthough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previous study of "Maritime Silk Road" in Ningbo,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and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dynastic history, trade objects, trade product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e study of "Maritime Silk Road" in Ningbo needs to be further deepened.

Key words: Ningbo; Maritime Silk Road; research review

宁波位于中国浙江省东部、长江三角洲南翼,北临杭州湾,西接绍兴,南靠台州,东北与舟山群岛隔海相望。宁波东临沧海,向西则是广阔的内陆腹地,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宁波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宁波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早在 7000 年前,这里的先民就已活

收稿日期:2018-10-19 网络出版日期:2019-03-16

作者简介:张 洁(1989—),女,安徽六安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盐业史方面的研究。

跃于海上,并创造了河姆渡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句章港(宁波)是中国九大著名军港之一。在唐代,明州(宁波)是中日交流的重要港口。北宋时期,中央政府于明州(宁波)、泉州和广州设立市舶司,宁波为官方指定的开放港口之一。元代,庆元(宁波)仍然是中国的“三司”之一,继续承担着对外开放的任务。明朝嘉靖之前,中日朝贡贸易的唯一指定港口便是宁波。可以说在明清政府推行海禁政策之前,宁波一直是中国古代海上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

得益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提出和实施,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也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讨论与研究的重要主题,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综述已有学者进行总结,其中不乏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概述。如,陆芸^[1]以包括宁波在内的八个城市为中心,对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做了简要梳理;戚文闯^[2]对宁波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性著作也进行了罗列。上述研究对本文的综述分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截至目前,学界尚缺乏专门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系统总结性论文。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以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开展国际性的综合研究与2000年以后包括宁波在内的中国部分港口城市提出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两个重要事件为节点,大致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史分为三个阶段,并探讨各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

一、肇端期(1987年以前)

1987年以前,只有少数中国学者以“海上丝绸之路”为题进行相关研究,并且多对古代宁波港的海外贸易情况较为关注。林正秋^[3]将古代宁波海外贸易与交流的发展历史,分为秦至五代、宋元、明清三个阶段进行考察,指出唐末五代宁波海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主要输出品是青瓷。宋元时期,宁波的海外贸易达到繁盛阶段,宁波除了继续同日本交往外,逐渐发展了与朝鲜、东南亚、南洋、阿拉伯等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通商贸易,输出的货物品种日益增多,贸易额不断扩大。明清时期为宁波海外贸易的挫折期,明初宁波作为堪和贸易的唯一指定港盛极一时;嘉靖以后,受海禁政策的影响,宁波海外贸易几乎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倪士毅等^[4]对两宋时期明州与高丽的贸易关系做了研究,认为两宋政府

对海外贸易的重视、社会经济的繁荣、造船业及航海技术的进步是宋与高丽得以往来贸易的重要原因。徐明德^[5]通过对海外贸易机构的设立、日本遣明使团迎送的礼节、海外贸易航线和公私贸易概况、“争贡事件”和双屿港贸易商场的出现等进行分析,指出明朝宁波海外贸易的扩大,促进了江浙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丝绸和青瓷外销是宁波对外贸易的最主要内容。忻鼎新等^[6]对明州港的丝绸贸易情况进行了梳理,指出源于明州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兴旺,浙江丝绸业得到大力发展。在林士民^[7]看来,从明州港输出的青瓷,通过“瓷器之道”涉足五洲,促进了中国对外的友好贸易关系。

宁波的海外交通史同样得到了学界的关注。王泰栋等^[8]以时间为线索对宁波港的对外关系史进行了简单概括和梳理,指出在“瓷器之道”的开辟和中日交往过程中,宁波港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丁正华^[9]从航海史的角度,对明州港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指出因明州航运经济地理上的优越性,以瓷器和丝织业为代表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佛教传播的重要发祥地等条件,使明州港在唐代中日航海史上的重大转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与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合编的《宁波港海外交通史论文选集》^[10],共选录了论文15篇,对宁波港兴起、发展、繁盛和衰落的过程,宁波的海外交通与其他活动的相互关系等做了比较系统、详尽的阐述,是研究宁波海外交通史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目。

日本学者也关注到了宁波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木宫泰彦^[11]在其著作中呈现了丰富的中日交流史实,其中有许多涉及宁波的部分,具有很强的资料价值。藤堂明保等^[12]指出宁波是遣唐使进出中国的大门。

1987年以前学术界关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海外贸易方面,对丝绸、瓷器等商品的外销,海外贸易航线、对象及影响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宁波的海外交通史同样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部分日本学者对宁波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有一定研究。然而,整体上看,这一阶段的研究数量较少,研究面窄且深度不足,可将该阶段称之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肇端期。

二、发展期(1987—1999年)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

开展国际性的综合研究。以此为契机,学术界对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渐兴起,并进入了新的阶段。

除了对官方贸易继续进行考察外,有学者开始关注宁波的私人对外贸易情况。葛国培^[13]指出,尽管明代宁波的私人贸易非常繁荣,但是朝廷并不允许。海商被迫走私,继而同倭寇、西方殖民者勾结骚扰沿海地区,其中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分外激烈。

商人和商帮在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对这一群体的考察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黄约瑟^[14]简要考证了唐代明州商人李延孝的生平事迹,强调了商人在9世纪的中日两国交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虞浩旭^[15]指出,唐宋时期,以明州商人为主要成员、以明州港为基地、以日本为主要贸易对象的明州商帮应运而生,这一群体曾在宁波的海外贸易史上发挥重大作用。

有关丝绸和瓷器的对外贸易研究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俞敏敏^[16]通过对浙江丝绸生产、外销与对外技术交流等问题的研究,论证了浙江是中国重要的“丝绸之府”,宁波在浙江丝绸外销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林士民^[17]通过对宁波出土文物的考察,指出宋元时期景德镇青白瓷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明州港(宁波)实现的。明州港是“陶瓷之路”的集散地与始发港。虞浩旭^[18]则认为,中国瓷器作为商品大规模外销始于晚唐,发展于南宋,极盛于元。他以唐宋元时期明州港海运码头遗址出土的四大窑系(长沙窑、越窑、景德镇窑和龙泉窑)产品为依据,对照世界各地的出土物,分析了四大窑系产品的主要外销港,认定明州港为中国唐宋元时期瓷器对外贸易重要和最主要的输出港。傅伯模^[19]谈到了明州与阿拉伯交往的情况,指出自隋唐时期开始,阿拉伯人来到杭州、明州等城市经商,出售阿拉伯特产,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运往阿拉伯和欧洲。

这一阶段学者开始较多地关注到宁波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意义。林士民^[20]通过对历史资料与遗址、遗迹的调查考证与研究,证明了唐、吴越时期浙东明州港不仅是中国与朝鲜半岛通商要埠,而且也是中韩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特别是佛教文化和陶瓷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与纽带。方祖猷^[21]叙述了高丽名僧义通在明州传播佛教文化的事迹,并阐述了其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林正秋^[22]介绍了宁波育王寺、天童寺、普陀“不肯去观音院”等寺院与日本进行佛教文化交流的史实,指出明

州和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相关研究专著的问世,标志着这一阶段对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始向着纵深发展。郑绍昌主编的《宁波港史》^[23]从经济、技术两个方面阐述了宁波港的发展历程,并总结了港口发展的规律。林士民撰写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24]一书详细论述了宁波的形成、发展、繁荣和演变过程,生动地再现了该地区先民的生产、生活、信仰、造船、航海等情况,并探讨了明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贡献。

纵观这一阶段关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学者们已不再局限于对海外贸易的讨论,开始涉及文化交流方面,并出版了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专著。尽管相关研究数量略少,研究广度和深度尚有不足,但是这些研究逐渐形成专门的领域,并为以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本文将这一阶段称之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发展期。

三、兴盛期(2000年至今)

21世纪以来,随着包括宁波在内的中国部分港口城市联合提出将“海上丝绸之路”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学术界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日益广泛,针对“海上丝绸之路”宁波段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可将此阶段的研究划分为四个方面:

(一)历史阶段演变过程

与前两阶段不同,2000以后学术界对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阶段有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大部分学者认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始于东汉,发展繁荣于唐宋,衰落于明清(鸦片战争以前)的观点。林士民^[25]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分为古越海上丝路的启蒙期、汉晋海上丝路的开通期、唐代海上丝路的发展期、宋元海上丝路鼎盛期、明清海上丝路禁滞期、鸦片战争前后至建国前的海上丝路萎缩期、新海上丝路腾飞期共七个时期加以论述。时间跨度从河姆渡先民稻作农业开始,直到今天。后来,林士民^[26]又撰文修正了之前的观点,认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东汉时期的吸纳开通期,二是隋唐五代的交融发展期,三是宋元时期的输出鼎盛期,四是明清时期的持续发展至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宁波开埠后的吸纳期。鲍志成^[27]提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

时间上限为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其时间下限应以学术界传统的帆船贸易结束到鸦片战争前后为限,不能无限的延长,他把近代西方列强以武力战争为先导的所谓“文化交流”成果也纳入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范围中去。李英魁^[28]在对造船与航海技术、丝绸生产状况、现存文化遗产与遗物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东汉晚期至东吴赤乌时代,最终形成于唐显庆年间。林浩^[29]则认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始于东汉晚期,发展于唐代,繁荣于宋元,后续发展于明清,并就各个时期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总体来看,学者们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界定在大的时间尺度上基本一致,仅在一些时间节点上略有差别。

为配合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的开展,2005年底,“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中国大陆、澳门、香港、台湾和日本等地的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出版论文集《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30]。该论文集共收录了47篇论文,从港口贸易、多元文化等方面揭示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轨迹与兴衰过程。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始走出国门,成为“国际化”的研究课题,来自中国港澳台和其他国家的学者研究为中国大陆学者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和思考维度。

(二)贸易状况

这一阶段,传统的对宁波港海外贸易研究继续推进。车垠和^[31]分析了从明州出海的大唐商人在9世纪后期主导对日本贸易的原因。张伟^[32]指出,明州作为连接宋丽两国往来的窗口与纽带,在两宋时期双方官方贸易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李蔚等^[33]通过对考古资料等的研究,揭示了明州与博多分别为唐宋时期中国与日本交流的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并有着悠久的贸易交往历史。李鑫^[34]通过对爪哇海域印坦号、井里汶号、黑石号三艘唐到北宋时期的沉船资料的研究,结合宁波地区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以及明州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的贸易资料,阐释了唐宋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发展与贸易模式。袁晓春^[35]通过对朝鲜李朝官方实录《备边司誊录》记载的两艘宁波商船孙合兴商船、“顺茂号”商船的海洋贸易史料的分析,再现了清代宁波海商从事海外贸易的基本情况。张继军^[36]以更为广阔的视角,对宁波双屿港对外贸易进行了考察,指出葡萄牙商人利用双屿港延伸了欧亚新航路,并与东亚已有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日贸易、东南亚贸易等传统的贸易路

线相沟通,建立起全球贸易网。

对明朝在宁波进行的中日勘和贸易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是这一阶段贸易研究的热点之一。陈小法^[37]通过考察宁波历史人物宋素卿渡日后的活动以及在勘合贸易中的表现,指出“宁波争贡事件”使得中日两国关系恶化,但并没使得明朝政府对日本采取闭关绝贡的政策,而只是更加严格地执行日本来贡与国内海禁政策。董杰^[38]认为所谓“宁波争贡事件”破坏明日关系、导致明日勘和贸易终结的说法站不住脚,导致中日间的勘合贸易失去支持并告断绝的根源是作为掌权者的大内家的意外陨落。徐永杰^[39]指出“宁波争贡事件”最终使明日勘合贸易走向终结,走私贸易盛行。戚文闯^[40]也认为“宁波争贡事件”是其后猖獗的走私贸易和“嘉靖大倭寇”的发端。万明^[41]指出明代宁波在西方扩张东来的历史背景下,作为长江下游最为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以及作为重要的走私贸易中心,其港口贸易体现了中外海上贸易中官方与民间矛盾冲突,反映了明代官方朝贡贸易即将终结和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兴盛发展的历史走向。王慕民^[42]指出16世纪初浙江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的内部因素是明代中后期作为宁波港腹地的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外部因素则是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的东来以及“宁波争贡事件”后中日官方贸易渠道的不畅通。王慕民^[43]从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两个方面论述了宁波在明代中日经济交往中占据的中心地位,同时研究分析了上述两种贸易方式转换的原因。王立诚等^[44]提取宁绍地区相关地方志中的碎片化信息,结合相关中日文献,对于“宁波争贡事件”的前因后果予以了探求。

宁波的海外贸易与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双向互动关系是学术界在这一阶段贸易研究方面的另一个热点。陈晔^[45]指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推动唐代明州城市的发展,同时唐代明州城市的发展也进一步深化“海上丝绸之路”。李小红等^[46]则认为海外贸易与唐宋时期明州地区区域地位的提升、商贸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海外贸易是唐宋时期明州地区发展的外在推动力。丁雨^[47]则主要通过考古材料对晚唐至宋初明州城市的发展与对外陶瓷贸易情况进行辨析,其认为以往的研究夸大了明州的早期繁荣和陶瓷贸易在其中的地位。在朱爱武^[48-49]看来,宋代明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导致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及其商品化、经济作物种植范围的不断扩大、制陶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以及市镇的兴起和大都市的繁华;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受到

繁荣的海外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舶司的设立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刘莉^[50]指出,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饮茶之风的开启也是宋代明州对外海上贸易的一个副产品。乐承耀^[51]分析了明代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制定的各种行政政策对宁波海外贸易的影响,并以史为鉴,对当代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

除丝绸、瓷器外,该阶段对茶叶外销的研究格外关注,并于宁波多次举办“宁波国际茶文化节”。宁波茶文化促进会编写的《宁波:海上茶路起航地》^[52]收录了第三届宁波国际茶文化节与会海内外专家及学者的15篇论文,认定宁波是“海上茶路”起航地,并深入研究了宁波“海上茶路”的历史。竺济法编写的《“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究文集》^[53]系统论述了宁波不仅为中国茶与茶文化对外交流通商的重要茶路与茶港,还很早就已开始种植茶树、烧造越窑青瓷贡茶具和拥有丰富的饮茶文化。竺济法^[54]认为“海上茶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上茶路”起航地与禅茶东传门户是独特的宁波元素,其内涵极为丰富。林士民^[55]也认可“海上茶路”是中国“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海上茶路”早在唐朝就已通过明州港将茶与茶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

(三)文化交流

宁波不仅是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的大埠,还是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一阶段,关于宁波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数量众多。在综合研究方面,刘恒武^[56]以文化遗存为原点,考察了宁波对外交流的历史实态及其变迁轨迹,全面地再现了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情况。谢安良的《丝路听潮:海上丝绸之路文化》^[57]一书阐述了宁波繁荣的海外贸易史和海外丝绸之路的远期发展,以及与其相关的佛教文化海外交流、日本遣唐使制度、青瓷文化等切面。林士民^[58]进一步指出,古代宁波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由明州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所带去的佛教、艺术、思想、建筑等文化对日本及朝鲜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依据对外文化交流对象的不同,可将相关研究分为三类:

1. 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日本是通过宁波与中国进行交流最为频繁的国家,因而学界对宁波与日本文化交流的研究十分关注。董有华等出版的专著^[59]汇集了历史上宁波与日本在友好交往中的大量史实。王慕民等^[60]阐述了从上古到明清时期宁波地方对外交流的发展情

况,并指出在中日交流史上,宁波和日本关系最为密切。孙一敏^[61]指出明州商人团为明州成为唐中后期中日交流最主要的港口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对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李广志^[62]对日本遣唐使往返明州的航线做了系统的考论,指出在日本实际前往大唐的16次使团中,从明州港登陆的有3次(共6船)。另外,遣唐使从明州返航也有3次(共4船)。王心喜^[63]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吴越国通过明州与日本交往的来龙去脉及其特点。张岩鑫^[64]通过介绍两幅地图——《舆地图》和《鄞县县境图》以及一幅绘画《入宋日僧荣西茶禅并修》,并结合丰富的史料阐述了宁波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孔媛^[65]通过石刻这一独特视角展开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南宋时期特别是在明州中日交流情况的既有认识,还原南宋时期中日交流的实态。毛阳光^[66]指出元代的宁波不仅是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与枢纽,而且也是对日战略进攻与防御的前沿,这给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刘恒武^[67]以日藏15—16世纪有关代表性的书画作品为焦点,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充分阐释文物本身包含的历史信息,以此考察明代宁波文人群体与旅华日本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历史实态。范金民^[68]和黄晓星^[69]以日本僧人策彦周良的入明经历为例,从不同角度探讨日本遣明使在宁波的文化交流活动。

此外,日本也是与宁波进行佛教文化交流最深入的国家。刘恒武^[70]认为宁波故城寺院的对外佛教交流开始于晚唐,兴盛于宋代,并延续到明代,其交流的主要范围是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的佛教界。张德华在介绍唐宋时期鄞州与日本的佛教交往的文章^[71]中还顺带讨论了明州港作为日僧出入中国的主要海路门户的情况。其它研究文章,如董贻安的《唐宋时期的明州茶禅文化与“海上茶叶之路”》^[72]、江静的《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73]、李广志的《明州吉祥院与日本平泉佛教文化之渊源》^[74]和《明州工匠援建日本东大寺论考》^[75]、刘磐磐的《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宁波天童寺》^[76]、何卯平的《东传日本的宋代宁波佛画〈十王图〉之研究——以奈良博物馆藏陆信忠笔〈十王图〉为中心》^[77]、刘恒武和陈竞翹的《萨摩塔与宋日海上丝绸之路》^[78]、冯晓霞《宁波寺院文化的理念与对外交流》^[79]也对这一方面进行了讨论。

2. 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

朝鲜半岛是通过宁波与中国进行交流的主要国

家和地区之一。李容准^[80]研究北宋明州高丽使行馆,增进了学界对北宋与高丽交往情况的了解。刘迎胜^[81]根据宋与高丽双方史料,确认高丽著名史家金富轼入宋均循“高丽—宁波”航线,强调了金富轼在宋丽交往中的作用。杨古城等^[82]认为:高丽(新罗、韩国)的佛教禅宗正脉始于中国禅宗第九代唐代明州的大梅法常,由其继嗣新罗迦智在新罗弘扬;在五代期间再由明州子麟向高丽弘传明州佛事法会;在宋代时期,则由新罗坦然在浙东明州得中国禅宗第十七代之禅法正脉始成韩国禅宗之基础。

3. 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

宁波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一定的关注。傅亦民^[83]探讨了波斯陶出土情况、波斯陶外貌以及唐代明州与西亚波斯地区的文化交流概况。金国平^[84]着重探讨了16世纪前期葡萄牙人在宁波双屿港的活动。廖大珂^[85]通过对Liampo(宁波)在欧洲地图的演变过程的考察,阐述了宁波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地位。在他看来,欧洲人记载中的Liampo的地理范围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演变的,集中反映了欧洲人对宁波港的认识变化过程, Liampo与双屿港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

(四) 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

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具有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资源。关注对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研究也是该阶段的一大亮点。

宁波市文化局编著的《中国·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图录》^[86]一书主要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图录、文化遗产的描述、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以及相关法律等方面进行了讨论。陈艳^[87]从文化遗产角度,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宁波部分的内涵、地位与价值,并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及保护方面将来要做的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2016年11月22日,宁波市人民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办法》,给予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以法律上的保障,该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对宁波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作用,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戴东生^[88]提出: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要加快依托宁波港口所具备的优势,打造港口经济圈,向内连接沿海的各个港口,并通过江海联运与海铁联运,覆盖经济发达的长江流域,辐射广袤的中

西部地区;对外通过联结东南亚与日韩黄金航道,辐射东亚以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以形成“一带一路”海陆联运枢纽。王倩^[89]着重研究宁波地区海商文化的发展现状,全面剖析宁波海商文化产业的内部状况和外部环境,并以此为依据,对海商文化产业化发展提出意见和对策。斜晓东等^[90]认为宁波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源地,宁波帮作为活跃在中国商界的最大商帮之一,两者的关系是始终相辅相成的,两者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都占据着重要作用。此外以历史的眼光深入探索研究了宁波及宁波帮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地位、当下功能和未来使命,使其在21世纪“一带一路”建设中争做桥头堡。

21世纪以来,关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呈现井喷的趋势,对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定义有了明确的界定,研究数量更多,研究涉及面更广,也更有深度,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最重要的是,学界开始关注到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问题,并就如何继续发挥现实作用提供智力支持。可以说这一阶段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兴盛期。

四、结 语

回顾学术界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到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先,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理论及方法日趋完善。从一开始的纯文献分析到多学科、跨领域的综合、交叉研究,特别是考古学及其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在有关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许多重要课题上已取得了重大成果。其次,研究内容由单纯的对外贸易扩展到涉及港口发展、海外贸易、文化交流等方方面面,并已出版了大量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研究专著。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研究更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最大的学术亮点。再次,宁波当地政府及学术界举办了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论坛、研讨会及博览会等重要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国际化搭建了交流分享的广阔平台。此外,宁波地区新设立了一批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机构,如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与浙江万里学院合作共建的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的成立,就为推动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

的平台和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宁波大学在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研究中一直“身先士卒”,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并已取得不错的成绩。

但是以往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问题。第一,断代史研究方面,学术界往往更多地关注文献和资料丰富的唐宋时期,对唐宋之前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关键期研究较少,少有的相关研究也略显薄弱,唐宋以后的研究也略有不足。第二,在贸易对象方面,对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东线及与日本、高丽的关系研究用力颇多,而对相对弱势但也非常重要的南线、西线的关注较少甚至空白。第三,在贸易产品方面,对于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大宗商品较为关注,对药材、书籍和铜料等其他许多小额贸易商品的关注不够,实际上这些小额商品也是构成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对象的重要内容。第四,在文化交流层面,佛教文化交流始终是讨论的重点,但是诸如文字、绘画、雕塑、建筑等其他门领域的研究涉及较少。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和对已有材料的深入挖掘,在新方法和新思路的指导下,未来有关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加丰富的成绩。

参考文献:

- [1] 陆芸.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J].丝绸之路,2013(2):13-16.
- [2] 戚文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综述[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2):80-88.
- [3] 林正秋.试论古代宁波海外贸易的发展[J].杭州商学院学报,1981(4):45-49.
- [4] 倪士毅,方如金.宋代明州与高丽的贸易关系及其友好往来[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2):81-91.
- [5] 徐明德.明代宁波港的海外贸易及其历史作用[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3(2):56-63.
- [6] 忻鼎新,高汉玉.明州港的丝绸外贸与技术交流[J].海交史研究,1982:15-21.
- [7] 林士民.试论明州港的历代青瓷外销[J].海交史研究,1983:98-104.
- [8] 王泰栋,李政.宁波港对外关系史略[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2,4(2):99-104.
- [9] 丁正华.论唐代明州在中日航海史上的地位[J].中国航海,1982(2):114-118.
- [10]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宁波港海外交通史论文选集[M].出版者不详,1983.
- [11]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12] 藤堂明保,赵安博.宁波:遣唐使进出的大门[J].日语学习与研究,1984(2):83-85.
- [13] 葛国培.明朝宁波的私人对外贸易[J].浙江学刊,1991(3):49-52.
- [14] 黄约瑟.“大唐商人”李延孝与九世纪中日关系[J].历史研究,1993(4):47-60.
- [15] 虞浩旭.论唐宋时期往来中日间的“明州商帮”[J].浙江学刊,1998(1):77-80.
- [16] 俞敏敏.古代浙江丝绸的生产、外销与对外技术交流[J].海交史研究,1998(1):68-72.
- [17] 林士民.从明州古港(今宁波)出土文物看景德镇宋元时的陶瓷贸易[J].景德镇陶瓷,1993(4):40-43.
- [18] 虞浩旭.试论唐宋元时期明州港的瓷器外销及地位[J].景德镇陶瓷,1999(2):51-54.
- [19] 傅伯模.唐以来我国浙江海上与阿拉伯的交往[J].阿拉伯世界研究,1997(4):48-52.
- [20] 林士民.唐、吴越时期浙东与朝鲜半岛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之研究[J].海交史研究,1993(1):13-23.
- [21] 方祖猷.宋明州高丽宝云义通大师事迹考:兼论其在佛教史上的作用[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6,9(3):35-44.
- [22] 林正秋.唐宋时期浙江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J].海交史研究,1997(1):53-60.
- [23] 郑绍昌.宁波港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 [24] 林士民.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 [25] 林士民,沈建国.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2.
- [26] 林士民.浅谈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发展与分期[C]//李英魁.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48-58.
- [27] 鲍志成.试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及主要特征[C]//李英魁.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59-72.
- [28] 李英魁.试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历史上限[J].东方博物,2004(4):115-119.
- [29] 林浩.关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各个时期特点的探讨[J].东方博物,2005(2):60-65.
- [30]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31] 车垠和.明州出海唐商的兴起与东亚贸易格局[J].社会科学辑刊,2008(5):139-143.
- [32] 张伟.略论明州在宋丽官方贸易中的地位[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13(4):50-55.
- [33] 李蔚,董滇红.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时期博多地区与明州间的贸易往来[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20(3):81-85.
- [34] 李鑫.唐宋时期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发展及贸易模式新观察:爪哇海域沉船资料的新启示[J].故宫博物院院

- 刊,2014(2):25-38.
- [35] 袁晓春.海上丝绸之路朝鲜史料中的宁波海商[J].民族史研究,2017(辑刊):223-238.
- [36] 张继军.双屿港与十六世纪全球贸易圈的关系研究[J].浙江学刊,2012(4):34-39.
- [37] 陈小法.明代“潜入日本”的宁波人宋素卿杂考[J].海交史研究,2005(1):51-61.
- [38] 童杰.从明日勘合贸易的历史进程看“宁波争贡事件”[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26(6):68-72.
- [39] 徐永杰.宁波争贡事件再研究[J].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11):64-69.
- [40] 戚文闯.宁波“争贡”事件与中日海上走私贸易[J].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34(6):7-12.
- [41] 万明.明代嘉靖年间的宁波港[J].海交史研究,2002(2):60-69.
- [42] 王慕民.海禁抑商与嘉靖“倭乱”:明代浙江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衰[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238.
- [43] 王慕民.明代宁波在中日经济交往中的地位:兼论官、民贸易方式的转变与嘉靖“大倭乱”的起因[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17(5):23-28.
- [44] 王立诚,孙立春.明代宁绍地方志中的“宁波争贡”与中日官方贸易[J].现代商业,2017(16):182-184.
- [45] 陈晔.唐代明州“海上丝绸之路”与对外交往[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14(2):124-127.
- [46] 李小红,谢兴志.海外贸易与唐宋明州社会经济的发展[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17(5):8-12.
- [47] 丁雨.晚唐至宋初明州城市的发展与对外陶瓷贸易刍议[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6):32-44.
- [48] 朱爱武.海外贸易发展与宋代明州经济结构的变迁[J].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08,20(4):38-42.
- [49] 朱爱武.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22(1):62-66.
- [50] 刘莉.宋代明州与高丽海外贸易发展因素分析研究[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5,37(2):115-122.
- [51] 乐承耀.论行政权力对明代宁波海外贸易的影响[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16(1):81-84.
- [52] 宁波茶文化促进会.宁波:海上茶路起航地[M].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
- [53] 竺济法.“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究文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 [54] 竺济法.宁波成为海上茶路启航地与禅茶东传门户的三大要素[J].农业考古,2011(5):268-271.
- [55] 林士民.明州港与朝鲜半岛“海上茶路”之研究[C]//沈善洪.韩国研究:第九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2(12):96-108.
- [56] 刘恒武.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 [57] 谢安良.丝路听潮:海上丝绸之路文化[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4.
- [58] 林士民.明州港在东亚汉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J].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04(3):34-37.
- [59] 董有华,李建树.宁波与日本航海交往史话[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
- [60] 王慕民,张伟,何灿浩.宁波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1.
- [61] 孙一敏.9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以唐日贸易为契机[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0:37.
- [62] 李广志.日本遣唐使宁波航线考论[J].南开日本研究,2016:139-152.
- [63] 王心喜.论五代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J].海交史研究,2004(1):29-38.
- [64] 张岩鑫.谈宁波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由两幅地图和一幅绘画谈起[J].艺术教育,2018(23):147-148.
- [65] 孔媛.南宋时期中日石刻文化交流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5.
- [66] 毛阳光.元代宁波在中日关系中的矛盾性格[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17(5):17-22.
- [67] 刘恒武.15—16世纪宁波文人与日本遣明使之间的书画交流[J].文博,2008(4):72-80.
- [68] 范金民.从《入明记》看明代嘉靖年间日本使者与浙江士人的交游活动[J].史林,2013(3):60-69.
- [69] 黄晓星.明代嘉靖年间日本遣明使在宁波的文化交流活动:以策彦周良的《初渡集》为例[J].大众文艺,2018(1):241-242.
- [70] 刘恒武.宁波故城佛寺对外文化交流史实考[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23(5):75-80.
- [71] 张德华.唐宋时期鄞州与日本的佛教交往[J].东方博物,2005(2):66-72.
- [72] 董贻安.唐宋时期的明州茶禅文化与“海上茶叶之路”[J].海交史研究,2005(1):43-50.
- [73] 江静.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9.
- [74] 李广志.明州吉祥院与日本平泉佛教文化之渊源[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25(3):28-30.
- [75] 李广志.明州工匠援建日本东大寺论考[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23(5):81-85.
- [76] 刘磐磐.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宁波天童寺[J].黑河学刊,2011(2):55-57.
- [77] 何卯平.东传日本的宋代宁波佛画《十王图》之研究:以奈良博物馆藏陆信忠笔《十王图》为中心[D].兰州:兰州大学,2013.
- [78] 刘恒武,陈竞翹.萨摩塔与宋日海上丝绸之路[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5):100-106.
- [79] 冯晓霞.宁波寺院文化的理念与对外交流[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7,30(6):52-55.
- [80] 李容准.北宋明州高丽使行馆[J].东南大学学报,2003,

- 33(4):526-528.
- [81] 刘迎胜.金富轼浮海使宋与宋丽交往研究[J].海交史研究,2015(1):1-10.
- [82] 杨古城,曹厚德.古代明州与高丽的佛教禅宗交流[C]//金健人.韩国研究:第四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48-153.
- [83] 傅亦民.唐代明州与西亚波斯地区的交往:从出土波斯陶谈起[J].海交史研究,2000(2):66-70.
- [84] 金国平,吴志良.试论双屿港起始年代[C]//舟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舟山工作站.舟山双屿港国际论文集.舟山,2011:168-178.
- [85] 廖大珂.世界的宁波:16—17世纪欧洲地图中的宁波港[J].世界历史,2013(6):43-55.
- [86] 宁波市文化局.中国·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图录[M].宁波:宁波市文化局,2002.
- [87] 陈艳.线路遗产与“海上丝绸之路”个案研究:以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宁波段)为例[J].世界遗产论坛,2009辑刊:107-116.
- [88] 戴东生.“一带一路”海陆联运枢纽发展研究:以宁波为例[J].城市观察,2014(6):30-36.
- [89] 王倩.宁波地区海商文化产业化发展研究[D].上海:上海海洋大学,2016:2-3.
- [90] 钊晓东,蒋金坤,黄秀蓉.“一带一路”的区域发展协同:宁波及宁波帮的功能使命[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29(2):65-69.
- (责任编辑:陈丽琼)